

# 拉铁摩尔：探寻红色中国的团结之力

□ 袁 剑



拉铁摩尔一行在延安访问时与领袖的合影，左三为拉铁摩尔

杂志有关，因此这个访问团后来常被称为“《美亚》小组”。

在卢沟桥事件一个月之前的1937年6月7日，拉铁摩尔一行从北平出发，前往延安。他们于6月10日抵达西安，住进当地著名的饭店——西京招待所，并得到了允准访问延安的介绍信，但必须自己解决交通问题。在这当口，他们找到了长期在中国生活、同时能提供汽车服务的埃菲·希尔同行，问题顺利解决。

从国民党统治地区前往延安要冒不小的风险，但拉铁摩尔还是决定试一试。6月18日，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他们全都挤进了希尔的汽车。为防止引起怀疑，他们没有退掉旅馆的房间，声称只是出去看一些皇陵。车子出了城门后一路前行，到了西安守军与红军之间的一处哨所。由于希尔在当地关系熟络，打过招呼后，他们顺利通过哨卡，并于21日抵达延安。仔细算起来，他们是进入根据地的第七批美国友人，同时也是全面抗战爆发前最后一批采访中共领袖和红军将士的外国人。拉铁摩尔一行在延安总共待了四天，在这短短几天时间里，他们得以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蕴含着的团结之力。

## 延安的四天

抵达延安的当晚，拉铁摩尔一行就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董必武、丁玲等前往他们的住处表示慰问，并专门举行欢迎晚会。22日上午，他们参观了在

窑洞中办学的抗日军政大学，并见到了朱德给学员授课的场景。下午，毛泽东在住处会见了拉铁摩尔一行，向他们详细阐述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对英美的相关政策，并回答了相关的问题。拉铁摩尔后来回忆道：“我看到毛泽东主席就是在延安，他和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多次接见美国作家的地方也是这里……这些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主席……他们具有惊人的明晰的头脑，预言了战争的爆发、演变和结果，以及战争对国共两党围绕着重爱国战的领导权进行的斗争和影响。”

当天晚上，毛泽东等陪同拉铁摩尔一行观看了文艺表演，拉铁摩尔特别注意到，“在延安，晚上他们举行文娱性的集会。大人物们，毛、周、朱和其他高级领导人全部到场，坐在观众中间，他们没有特权者的席位，完全同群众打成一片。这是他们了解人民的想法的重要手段之一”。这种场景对拉铁摩尔的触动非常大，因为这跟他在上海、北平这些地方的所见所闻很不一样。这种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团结平等的精神，将会爆发出更大的力量。

23日上午，因为当地下起了瓢泼大雨，原定与朱德等人约定的篮球友谊赛不得不取消，拉铁摩尔一行改为在窑洞里采访朱德。朱德向他们介绍了当时中国的国内军事形势以及抗日战争的军事战略等问题，并指出，中国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必须依靠全国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展开这场群众

运动。下午，拉铁摩尔拜访了博古，向他具体了解边区的民族政策以及少数民族的相关情况。当晚，他们一行又前去拜访周恩来，并就国共和谈以及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了深入交谈。

24日上午，拉铁摩尔一行受邀在朱德主持的红军指战员大会上发表演讲，虽然条件简陋，但听众依然多达两千多人。当晚，他们结束对延安的访问，启程返回西安。在这段延安之旅结束后不到两周，震惊世界的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打响。

## 团结的伟力

“在延安，我们是站在中国和亚洲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封建主义革命的中心。”要是没有这次延安之旅，拉铁摩尔对于中国社会与政治的认识将是不完整的，因为在这里，蕴含着变革中国的决定性力量。拉铁摩尔的这次延安之旅，让他找到了这支在中国社会中曾经被误解和掩盖，但却始终在蓬勃壮大的力量。他后来的一段记述，能够让我们清晰地体会到他内心所受到的震撼：“有天，在回西安的路上，当我们等待汽车发动机冷却下来时，我问希尔：‘埃菲，你见过各种各样的中国人，你认为这些人怎样？’因为他在延安四处走动，跟人们攀谈过，我想听听他的反应。他说：‘告诉你吧。我遇见过很多国民党知识分子。我也曾跟军阀有来往。几乎没有什么样的中国人我没有打过交道。但是在延安，我第一次看到了一位能够领导中国的人（指毛泽东）。’”

在这之后不久，拉铁摩尔撰写了两篇文章，《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陕北之行》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现在和将来：统一战线的理论》，虽然未能公开发表，却通过一些渠道让世界进一步了解到红色中国所蕴含的团结之力，也坚定了拉铁摩尔支持中国抗战的信心，同时他认为，中国必将在战后世界政治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正因为如此，他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不得不背井离乡、远渡英伦。但历史终有公论，到了1972年，随着中美关系转暖，他也在古稀之年得以踏上新中国的土地，那个在他青年时代曾经残破不堪、如今却日新月异“第二故乡”。

唐代名臣颜真卿不仅以书法著称，其勤谨忧民的为官之道和以身殉国的经历也被历史铭记。颜真卿所属的琅琊颜氏自魏晋至唐有若干人任国家重臣，而且颜氏家族志行高洁，学博才精，文武兼备，往往在治平时为治国之能吏，在危难中则为守社稷之良将。颜氏家族在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中，体现出公忠廉直、刚贞一志的家风。

## 学素相承 有声邦党

《颜氏家庙碑》是颜真卿为其父颜惟贞刊立，其中回顾了颜氏家族从先秦到唐代的传承和发展。颜家世代相承，最引以自豪的家业是学有所成，比如“子泉、弘都之德行，巴陵、记室之书翰，特进、黄门之文章，秘监、华州之学识”。

“子泉”指颜回，是颜氏家族始祖。颜回最得孔子思想旨趣，也是因贤能最为孔子赏识的弟子。“孔颜之乐”是儒家推崇的美德臻境。同样以“德行”著称的“弘都”，指颜真卿十三世祖颜含。《晋书·孝友传》记载颜含孝悌显于当世。后来随辟为参军的西晋末琅琊王司马睿（即后来的晋元帝）南渡，颜氏孝悌之德自此在江南广为传播，累世家风不衰，广受赞誉。“巴陵”和“记室”分别指颜真卿九世祖颜腾之和六世祖颜协，皆以书法见称于当世。“特进”“黄门”分别指颜真卿十世叔祖颜延之和五世祖颜之推，均以“文章”载誉天下。“秘监”和“华州”成就在于“学识”，分别指颜真卿高祖父颜师古和祖父颜昭甫。颜师古在唐太宗朝官至秘书监，对经、史、子、集典籍的解读和传播起了重大作用。颜昭甫被称为“硕儒”，长于训诂，工于书法。

颜氏家族从先秦到唐代，门庭显赫，代有才人，然而他们矜夸自重的并非高官厚禄、权位名利，而是世代相承的“德行”“书翰”“文章”“学识”四方面的家学成就。颜氏家学替代官职、财富，成为家族前赴后继、世代守卫的家业。

## 儒雅为业 公忠杰出

碑文中总结，颜氏家族能在乱世存续，在太平世彰显，是因为世以儒学为业，一方面“奉儒守官”，重视经史之学，学有成就，为立世出仕、建功立业打下坚实的才能和品格基础；另一方面以“儒雅为业”，重视儒家德行修养，尊礼重孝，重名守节，公忠尽职，忧国忧民。前者形成家学，后者成就家风，家学涵养家风，家风成就士族，培育世家。

颜真卿父亲颜惟贞所生七子与伯父颜元孙所生五子皆仁孝才博，书判（行政司法判决文书）尤佳，均仕进为官。祠堂之上，兄弟位次相陪，衣袂相连，“谁言百人会，兄弟也次陪”。颜氏兄弟不仅德才优异，吏能也十分突出，在仕宦任职中，素以公廉正直、勤政爱民、忠君报国闻名，其中尤以颜真卿为表率。

颜真卿中进士前，家族中唯有伯父颜元孙高中，因此家族对颜真卿也寄予厚望。开元二十四年（736年），颜真卿在吏部铨选中，以“三判优”擢拔，被授予朝散郎，进入掌管官方文件的秘书省著作局，任校书郎，踏入仕途。此后，他屡建功绩，被委以重任，多次获擢升，从正九品下（醴泉县尉）的官吏进至从一品大员（太子太师）。任醴泉县尉时，他主管当地的治安和防卫，勤勉尽职，深受百姓爱戴，有“清白”之誉；任监察御史期间，三赴各地巡察。巡河东、朔方二地之时，处事得当，明察纠偏，受到朝野推崇。巡河西、陇右之时，调查审理五原郡冤案，洗冤昭雪，顷刻天降大雨，当地人赞称“御史雨”；在两任刺史任上，他治理出色，“课最为诸路第一”。饶州刺史任上，了解到当地朝政不修，盗匪横行，他整顿吏治，简省徭役，严抓治安，缉捕盗

# 颜真卿及其家族的忠义家风

□ 柯 昊

贼。德兴县妇女程小娘父兄被强盗杀害，自己也曾被劫掠，颜真卿得悉后，详查案情，马上差遣捕役擒获盗首，磔之于市，一时大快人心，自此“四境肃然”。之后，调任抚州刺史，颜真卿修建“土滕陂”，解决旧坝年久失修、雨季洪水淹没农田、旱季庄稼缺水灌溉的问题。抚州百姓怀念颜真卿德政，改土滕陂名为千金坝，建鲁公祠、忠孝堂，四时致祭。宋代以后，历代撰修图经方志，往往把颜真卿与范仲淹的德政相提并论，称为“颜范遗风”。

## 刚贞如一 国之忠烈

颜氏家族以忠义家风塑造出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文化精神，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安禄山反于范阳。当时，颜真卿任平原太守，从兄颜杲卿代理常山太守，郡属皆由安禄山管辖。河北各郡纷纷沦陷时，颜真卿积极联合各郡县义军，与颜杲卿互为犄角之势，抗击叛军。在多方联络号召下，河北各路义军合兵20万众，共推颜真卿为盟主，立志匡扶朝廷。颜真卿在平原城西门外举誓师道：“国家之恩，戮力死节，无以上报！”使军民振奋，义愤填膺，誓与平原城共存亡。天宝十五年（756年），叛军围攻常山，残酷屠杀颜杲卿之子颜季明。不久城破，颜杲卿被押到洛阳。他临难不惧，瞋目怒骂安禄山，最终被割舌肢解而亡。整个平叛过程中，颜氏家族满门忠烈，“手足寄于锋刃，忠义形于颜色”，宗族三十余口为国捐躯，共赴国难。

颜真卿撰写《颜氏家庙碑》时，预示着他将继续选择担负家仇国恨，以忠义照耀门楣。德宗兴元元年（公元784年），颜真卿被派出平定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时，受到胁迫，怒斥叛军：“你们听说颜常山没有？那是我兄长，安禄山反叛时，首先起义抵抗，后来被俘，也不住口地骂叛贼。我年近八十，官至太师，誓死保持名节，怎么会屈服于胁迫！”最终勇赴绞索，为国捐躯。

《颜氏家庙碑》中另有重嘱，后人要“述遵前人，不敢失坠其志事”，亦有诫勉今人之意。

# 明清社会的多元慈善

□ 狄鸿旭

府的支持和倡导。明清朝廷建设诸如义仓等公益机构，颁行谕旨禁令，扶持对具有慈善色彩的社会保障事务等，此举得到地方士绅响应。许多善行善事记载入地方志，客观上也引领着社会风尚。

## 慈善群体组织多样

乐善氛围是慈善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慈善观念影响下，社会中行善事的群体和组织不断发展。明清时期的官府在慈善制度和组织建设方面做了不少推进工作。比如，明清律令中规定对“凡鳏寡孤独及笃疾之人，贫穷无亲属倚靠，不能自存”之人予以收养，由官府给予粮食资助；倡建孤老院、养济院、育婴堂、惠民药局、留养局、漏泽园等慈善机构，建设各类具有赈济功能的义仓、社仓等。同时，从晚明至清中叶，很多慈善机构由官办向官办民助和民办转型，社会力量不断走向慈善事业前台。明清时代的江南为“人文渊薮”之地，经济文化发达。晚明时起，江南士人高攀龙、陈龙正、袁了凡等大力倡导力行慈善，并创办同善会等慈善组织。袁了凡著有《了凡四训》，秉持“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立命之学，以行善积德规劝世人，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清代，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士绅行善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并呈现区域传播、家族传承等特征，如苏州彭氏是著名的“积善之家”，代表人物彭绍升“尤注意周济贫困孤寡等善事，从事放生、惜字、刻经与施衣等善行”。晚清著名的改革派思想

家冯桂芬也是著名慈善家，他不仅积极参与地方慈善，还建议吸取荷兰、瑞典等国教养贫民的方法，将劝善与惩恶相结合，提出了对贫民教、养并重的观点。余治、李金鏞、盛宣怀、经元善等晚清绅商，都是名著一时的慈善家，参与筹建了大量地方慈善机构和组织灾荒赈济。

商人群体是开展慈善事业的中坚力量，清代著名商帮如晋商、徽商等都积极投身慈善事业。晋商如榆次常氏家族、灵石静升王氏家族等，在经商致富的过程中，广泛从事养老、慈幼、施药、义学和造桥修路、修纂县志等公益慈善事业，践行“达则兼济天下”理念。不仅有实力的绅商群体热衷公益慈善，普通民众也广施善行，如广大妇女群体，多积极参与育婴堂等组织的公益活动。

## 慈善领域覆盖广泛

明清之际，不仅慈善群体和组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慈善所覆盖的领域也更加广泛。在明初，各地社会福利设施或慈善团体的数量有限，除官营养济院、药局等外，民间慈善团体数量尚少。到了清代，各类民间慈善组织团体数量大为增加，同时团体种类更为齐全。基本覆盖慈善所涉的济贫、解难、养老、慈幼、教育、灾赈等若干领域。除了直接行善，社会力量主要通过筹建各类慈善组织行使慈善，并得以持续发展。如有收容孤老贫病者的安济堂、有收容流浪者的栖流所，有收养婴儿的育



## “善念”观念社会流行

俗语云：“日行一善，胜过日进斗金”。善念善行是中华文化的底色。明清之际，伴随商品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繁荣，公益慈善的观念、群体和行为得到发展，社会各阶层普遍认可慈善观念，士绅商民纷纷参与慈善活动，慈善机构和群体开始组织化。

## “善念”观念社会流行

明代以降，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主导，同时，自宋以来儒释道三教合一趋势更为明显，皆有丰富的“行善”价值理念。就儒家而言，儒学倡导事功，士绅阶层多以“修齐治平”为立身准则。一些读书人进而为官，退而为绅，通过自身所能的方式，救助黎民百姓，投身慈善事业，成为一种“经世”实践。明清时期，佛道教的“积德行善”观念在民间得到普遍传播。社会观念普遍认为，“行善”能够为自身乃至家族积累福报。不断发展的商贸交流，使商人群体崛起，商人在经商中对财富的极不稳定特质有深刻感受，随之形成的“散财行善”观，成为善念传播的因素。

当然，慈善观念的传播也得到了官

